
周登龍先生訪問紀錄

主訪：陳進金*

記錄：林建廷**

時間：2020年6月20日(六)

地點：臺北市臨沂街周宅

列席：周美里***、游淑如****



【圖1】周登龍現場訪問照

說明：由右至左分別為周美里、周太太、周登龍與陳進金；游淑如拍攝。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

*** 受訪者長女、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專員

周登龍先生，1928年12月7日出生於臺南州曾文郡下營庄的中營，中營國民學校畢業，1941年就讀臺南第二中學校。1945年考上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因太平洋戰爭之故，入學改為入伍，擔任學徒兵。同年8月15日終戰，隨即復學，而學校也在戰後併入臺灣大學法學院。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3月8日起中華民國之兵力即來臺灣鎮壓。至3月10日，周登龍在任處躲避動亂，不料軍入闖入搜刮財物，離去前更肆意槍擊，致使子彈貫穿胸膛，經急救始得倖存性命。日後重返臺大讀書，1948年商業專修科畢業，任職於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插班考上臺大經濟系，1951年經濟系畢業。曾任臺南市立商業職業學校教員、臺南機場美軍空軍基地銀行職員、經理。1975年起，投資針織事業，並經營其他生意。

回顧大半生及二二八事件的經歷，周登龍指出，日本時代後期進入皇民化運動階段，民族差別待遇漸次顯著，戰爭也干擾就學和生活。戰後則新政府治理不當，造成臺灣民眾期待落空，甚者部分人士轉向左翼；而二二八期間，周氏純然無辜受害，卻由於「涉及」事件，影響未來工作，既不易獲得平等的謀職機會，也必須三緘其口，不輕易向外人告知自身遭遇。儘管歷史烙印的傷害，可說是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但周登龍仍認為要留下紀錄，供大家明白來龍去脈。往昔臺灣人對中國政府的認知有限，以及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如今都沒有被求刑，乃無奈且遺憾，他希望至少應公布姓名。

出身與成長

我是周登龍，1928年12月7日出生於臺南下營庄的中營。¹由於周家沒有什麼顯赫的家世，況且我只有讀小學以後的事情才比較記得住，所以家庭背景無法談得很細。我爸爸叫做周海水，²媽媽叫做周郭會，我還有一個姊姊、一個哥哥，我是最小的，手足3人彼此都相差4歲，大哥在先，大我8歲，接著大姊多我4歲。

我爸爸曾在學校教書，日本時代能當上小學老師，已經是很不簡單的事了；我也看過他的聘書，是大正時代的1920年代發的，上面寫著月俸「6圓」。³那時候，臺灣的小學分成公學校、

- 1 中營，即今臺南市下營區中營里。該里位於下營區東南方，原為鄭氏時期設鎮屯兵之處，屬頂營與下營之間，故稱中營。至清代，與開化里及茅港里部分皆屬茅港尾東保中營庄；日治時期，屬茅港尾大字中營小字。1946年，由於地廣人多，遂析分成中營、和化兩村，另有部分歸入茅港尾村。現今再改村為里。也因此，周登龍出生於中營，惟據受難當時的戶籍資料，已改為臺南縣下營鄉茅港村。參見內政部，「地名查詢服務網」，下載日期：2020年9月8日，網址：<http://gn.moi.gov.tw/GeoNames/index.aspx>。
- 2 周海水（約1898-1930），臺南下營人，1919年起任蘇荳公學校（今麻豆國民小學）、下營公學校（今下營國民小學）之訓導心得。1922年獲公學校訓導免許狀，同年任茅港尾公學校（今中營國民小學）准訓導。1926年，通過臺灣員檢定筆試，並於臺北東園公學校（今東園國民小學）通過農業實習實地試驗（技能考試）。參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年7月27日，網址：<http://ds3.th.gov.tw/digital/digital.php>；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7月27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 3 依職員錄載，周海水1919年在蘇荳公學校的月俸為11圓，1920年在

小學校，小學校主要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只有少數臺灣學生可以入學。但那些有資格入學的臺灣人，家庭條件若不是有人當公務員，就是有錢人；正是因為我爸爸具公務員身分，兄哥才能去讀麻豆的小學校。⁴ 可惜的是，我爸爸 32 歲就過世，當時我 2 歲、兄哥 10 歲、大姊 6 歲，導致兄姊還有受到父親的直接影響，我就沒有了。不過，他生前是教育家，一定會依年歲安排子女入學，這形成一種家風，所以輪到我滿 6 歲（虛歲 7 歲），同樣準時入小學，差別在我讀的是公學校，而不是小學校。

小學我唸的是「中營國民學校」，⁵ 前身即是專門給臺灣人子弟就讀的公學校，最初校名稱爲「茅港尾公學校」，因爲學校所

下營公學校爲 13 圓，1921 年 29 圓；1922 年在茅港尾公學校爲 33 圓，1923 年 37 圓，1924 年 39 圓，1926 年 41 圓，1927 年 43 圓，1928 年 45 圓，1929 年 47 圓。參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 年 7 月 27 日，網址：<http://ds3.th.gov.tw/digital/digital.php>；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0 年 7 月 27 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 4 指「麻豆尋常高等小學校」，今麻豆國民中學。創校於 1910 年，本爲臺南尋常高等小學校蕭壟分教場之麻苳分離教室；1912 年獨立爲麻苳尋常小學校，隔年改爲麻苳尋常高等小學校。1921 年，改名麻豆尋常高小；1941 年再改制爲麻豆國民學校。1946 年改爲麻豆鎮第六國民學校，同年 4 月再改制爲曾文初級中學。1968 年改制爲今名。參見「臺南市立麻豆國民中學」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8 月 16 日，網址：<http://www.mdjh.tn.edu.tw/index.php>。
- 5 中營國民學校，即今中營國民小學。創校於 1910 年，初名茅港尾公學校；1941 年改制爲中營國民學校。戰後，1946 年更名爲下營鄉第三國校，1947 年再改爲中營國民學校。1968 年改制爲今名。參見「臺南市下營區中營國民小學」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8 月 16 日，網址：<http://www.jyes.tn.edu.tw/index.php>。

在地的舊名為「茅港尾」。⁶ 差不多距今 300 年前的清朝時代，茅港尾原本是一處很熱鬧的大街市，又叫做「茅港尾街」，從名字上來看也知道，那裡有一個港口，並且形成一個市街；但據說有一年大地震（1862），房子都倒了，從此那裡便沒落下去。話說回來，我剛去讀小學的時候，學校還叫做茅港尾公學校，可是畢業那一年，小學校、公學校已經通通改成「國民學校」，有的學校還改了校名，像「茅港尾」就改名「中營」。



【圖 2】周登龍小學時期

資料來源：周登龍提供。

- 6 茅港尾，今屬臺南市下營區茅港里。該地原為倒風內海的一處汊港，17 世紀起，荷蘭人記為‘Omkamboy’；鄭氏時期改以「梅港尾」記之，並開發為貨物進出口。至清代，1684 年設置開化里茅港尾堡，逐漸發展成臺南、嘉義之間的重要市鎮。後因上游急水溪改道，1846 年茅港尾已有淤塞情況，喪失交通功能；1862 年再遇地震，市鎮遂告沒落。進入日治時期，茅港尾地位益形下降，分別隸屬麻豆支廳、曾文郡。戰後，仍屬下營之村里。參見張溪南，《南瀛老街誌》（臺南：臺南縣政府，2007），頁 112-122；許清保，《南瀛港口誌》（臺南：臺南縣政府，2007），頁 33-36、116-126。

對於學校的生活、師友們的印象，我沒有太深刻，不過至今我大致還記得，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每一位班導師的名字。他們大多是臺灣人，只有我六年級遇到的老師是日本人。課業方面，我覺得還好，沒什麼特別的，老師教的都是普通的科目，跟現在小學生所學的差不多。而在學期間，我不會遇到有臺灣學生被瞧不起的問題，至少我沒有這種感覺。這是因為學校的日本老師只有少數幾個，臺灣教師居多，所以不會看不起臺灣學生；一直要等到我讀中學碰到皇民化的時候，才多少有遇到臺灣學生被歧視的情況。

我是 1941 年進中學的，就是現在的臺南一中，⁷ 這間學校主要是給臺灣學生讀的，臺灣人應占有 9 成。不過，古早真正的「臺南一中」⁸ 則幾乎都是日本人去讀，同樣占了 9 成之多。我們在戰前入學，那時候讀臺南第二中學校，其實是二中校友，只是光復後二中變成一中，一中變成二中。陳水扁則是戰後才讀臺南一中，是正港的一中校友，但現在我們對外都說自己是一中的校友，所以我跟阿扁也是校友。

7 臺南一中，即今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創校於 1922 年，原名「臺南第二中學校」；戰後，1945 年改制為「臺南第一中學」，1970 年再改制為高中。參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8 月 16 日，網址：<https://www.tnfsh.tn.edu.tw/bin/home.php>。

8 指臺南第一中學校，即今臺南第二高級中學。1914 年創立，原名臺灣總督府臺南中學校；1922 年更名為「臺南第一中學校」。戰後，1945 年改制為臺南第二中學；1970 年改制為高中。參見「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8 月 16 日，網址：<http://www.tnssh.tn.edu.tw/default.asp>。



【圖 3】周登龍中學時期

資料來源：周登龍提供。

日本時代，中學的校長一定都是日本人，老師也大多是日本人；而且在這個時候，皇民化、歧視的問題就很明顯了。學校、政府機關會鼓勵我們改姓名，但沒有強制。事實上，會去改姓名的人，比較多的是家裡有人當公務員或者吃日本人的頭路；然而就算改了，頂多只是添一些些福利罷了。跟日本機關沒關係的臺灣人，大概不會積極去改，像我家自從父親過世後，沒有人再當公務員，因此我們就沒有改日本名字。再者，進入中學以後，我確實感覺到有的日本老師會歧視臺灣人，例如言論上說我們是「ちゃんころ」（清國奴），這款惡質的老師也有，他不忌諱嘛！很順口地講出來，但也不是全部的日本老師都這樣。總之到了中學階段，臺、日出生變得很分明，第二中學校的學生跟第一中學校的學生相遇還會打起架來，並且是臺灣陣營對抗日本陣營，爲了民族意識、尊嚴而鬥爭，既然你日本人看不起我臺灣人，那我



【圖 4】周登龍中學時期

資料來源：周登龍提供。

臺灣人更看不起你日本人。

我幾乎沒有日本朋友，這主要在於我讀的小學、中學都是臺灣人居多，遇不到幾個日本同學。比如在第二中學校，一個年級大約 150、160 名學生，分成 3 個班，每個班的日本同學不超過 5 個。那些日本人比較不會讀書，可能他們有自卑感，覺得讀書落後臺灣人，就無話無句（沉默寡言之意），不太跟人家講話，我跟他們就沒有什麼接觸。唯一例外的是中學同班的一位日本同學，還能跟我們臺灣學生聊上幾句，日本投降後他回去日本，之後又來臺灣找同學。而在課業表現上，我覺得自己的成績普通，不算尖端，也沒什麼偏好。中學裡，我大約排在全年級前三、四十名，最好的時候是前 20 名，只是因為日本時代的臺南第一中學校、第二中學校都是升學名校，學校環境幫助我考上臺北高

商。⁹ 當然，自己仍要努力，畢竟很不好考，同一個年級裡不到一半會升學，甚至只有三分之一，150 個人可能只有 50 個有辦法繼續升學。

而日本時代的學制，不像現在區分為初中（國中）3 年、高中 3 年，必須一口氣要讀完中學 5 年，再來進高等學校 3 年，接下來讀大學 3 年；等於中學讀完，要再經過 6 年才能大學畢業，比現在的學生讀得還久。不過，這種學制有一個特例，即中學四年級就允許去考高校，考得上的人便能節省一年的時間。當時臺灣只有 4 間高等教育機構，臺北帝國大學、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中高等農林學校，即中興大學的前身，以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至於臺北高等學校，是進入臺北帝大的跳板，相當於專門學校。

讀中學以前，我都住在草地（指鄉下），之後我才寄住臺南市讀書，一直到中學三年級為止。由於戰爭的緣故，升上四年級後，大家都陸續疏開了，不僅一般平民要疏開，校方也強令外地學生不得住臺南市，漸漸地沒辦法再住市區，我變成要通學讀書，很辛苦。住在中營，每天早上 5 點就起床準備，媽媽也跟著起來煮早餐給我吃，替我準備便當，6 點出門，步行一個小時的路到隆田，等待 7 點的火車駛向臺南市，再走去學校，但是也

9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即今「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創立於 1919 年，原名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1926 年改為臺北高等商業學校，1944 年改為臺北經濟專門學校。戰後，1945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專科學校，1946 年改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1947 年併入臺灣大學法學院。至 1987 年，獨立成為管理學院。參見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7 月 18 日，網址：<http://www.management.ntu.edu.tw/>。

因為戰爭的關係，中學我只讀4年就畢業，接著考上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當時考試科目主要有英文、國文（日文）、數學。有趣的是，跟我同時畢業的也有五年級的前輩（學長），我們一起去考臺北高商的二中學生，共有30個人應考，結果5個上榜，五年級的考中兩個，四年級的考中3個，其中包括我，這說明不一定多讀一年就會比較厲害。同樣的，那時候許多學校的校名也改了，臺北高商叫做「經濟專門學校」，臺中高農改稱「農林專門學校」，臺南那一間則改為「工業專門學校」，否則之前都叫做高等商業、高等農林、高等工業。

爲什麼我想要讀商科？原因是我有色盲，商科以外沒有選擇。這恐怕是家族遺傳吧！小時候聽兄哥在講，我還不怎麼相信，他說他小學畢業時，曾報考農業學校、師範學校，卻礙於色盲而沒有通過測驗。對此我想過，日本時代的老師有那麼差嗎？不明白自己的學生有色盲，竟鼓勵他去考那些要測驗色盲的學校？後來我兄哥改讀臺南第二中學校，成爲我的學長。中學畢業後，兄哥去日本報考7間學校，全都報醫科，這也是很多臺灣學生的第一目標，希望以後當醫師，所以第二中學校差不多有一成的畢業生都想讀醫科。事先他還研究過色盲測驗，把檢查表背起來，想說應該考不倒，就連後門都打聽了，有人告訴他哪間學校可以用錢收買，色盲測驗便能夠通過，他也心動了；無奈色盲都要切實測驗，他仍舊不能通過全數的相關測試，就這樣被刷掉。

我兄哥真的很渴望讀醫科，但他就是過不了關，只好放棄升學。他成績優秀，是狀元學生，第一名考進中學的，畢業時也名列前茅；可惜太固執，明知冒險還要硬闖，如果他選別種科系，或許就能夠繼續讀書吧。因此，我不會選擇由於色盲而不讓我入

學的科系，工、農、醫等科系，都無法收色盲學生，只有商科不會考量色盲問題。

服役與復學

1945年，我17歲，從臺南第二中學校畢業的時候是3月，二次世界大戰還沒結束。我記得很清楚，卒業式是在3月9日，可是全臺被空襲得很厲害，自3月起學校就不再上課，我們疏開了，躲到草地，都沒有在臺南市區，所以我們草地人沒有參加卒業式，我連畢業證書也沒領。不過我已考上高商，便特別會去注意ラジオ（收音機）的入學通知，否則沒聽到的話，就無法北上讀書。當年所有通知都用廣播的，很多家庭會準備ラジオ，每個人也得時時收聽廣播，才不會錯失消息；我們倚賴ラジオ的程度，就跟現在看電視一樣，每天都在看電視，自然會知道很多消息、政令，以前則是靠收聽廣播。

廣播通知3月12日是入學典禮，我就趕在當天之前抵達臺北，沒想戰事吃緊，入學第一天馬上「入營」，成為學徒兵，那時候全島的大專學生幾乎都去當兵。校舍也化身為現成的兵營，不用另外下部隊，但事實上正式的軍區根本收容不了那麼多學徒兵。而從3月到8月，近半年的時間並沒有做什麼大事情。第一個月只是待在學校教室，接受躉跤步（tsàm-kha-pōo，踏步）等基礎訓練，第二個月開始分配我們到外地，駐紮在桃園南崁一處農家，每天去溪邊做工，挖防空壕，或者海邊挖戰壕，試圖阻擋敵軍登陸，還有一堆雜七雜八的工事。再來，我們被調去新店、

坪林的山區挖山洞，以便躲藏。這些學徒兵隊伍各有一個番號，其中 3 支小分隊會結成一支小隊，我屬於第六小隊的第三分隊，一個小分隊差不多有 15 個人。

儘管有薪水，一個月 15 圓，相較於同時期的公務員，像教員月俸 30 圓，看起來入伍的月薪還算不錯，可是那些日子很苦。一來是沒有一天休息，都在勞動，幾個月裡都是如此的軍旅生活，一點點書也沒唸到；再來就是有一個壞處，就是時常會餓肚子。戰時物資奇缺，食物等民生物資都用配給的，不過尚未當兵之前，可以說只有都會的人比較受到影響，鄉下人就沒差。因為鄉下人自家生產糧食，已經夠吃，何需配給？只有都市人才需要領配給，鄉下沒什麼人在領的，像我們自己就有種田，家裡並不因施行配給而缺糧。所以，那時候主要影響我的是戰爭末期的空襲，必須疏開躲避，不然就是從中營長途跋涉去市區上學，其他方面的影響則有限。

當起學徒兵就不一樣了，軍糧也是定額配給，一餐才吃半碗飯，僅一點點肉幼仔（bah-iù-á，肉屑）而已，偏偏我們是 16、17 歲的年紀，正值青少年發育期，這種份量完全吃不飽，餓得要命。薪水又不能夠直接拿來吃，更何況錢再多也無法任意買食物，都有管控啊，所以我們很可憐。幸好駐在地附近有幾戶農家，他們比較不缺吃的，又大多是臺灣人，臺灣話會通，我們就跟他們討清飯（tshìn-png，剩飯）。這些農家會免費請我們吃，畢竟曉得臺灣囡仔在當兵，大家都嘛很同情啊！換做是日本人，他們恐怕不會那麼慷慨，想說日本人餓死算了。

等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當天，我就明白戰爭結束了。那時

候我在坪林山區，沒有聽到天皇玉音放送，¹⁰ 但即便軍中有收音機，那邊也收訊不良，雜音很多，聽不懂在廣播什麼；因此是臺北的司令部有聯絡兵，當天馬上跑來通知日本投降，大家才得知的，不然在山區誰也不知道有此大事。之後，很快地軍隊長官便把我們帶往臺北就地解散，臺北高商也隨即安排開課；生活恢復正常，除了少數的臺灣人打日本人的事件之外，社會上依舊有一定的秩序，沒什麼紛亂。而戰前的日本、臺灣就已經分別使用日幣、臺幣（臺灣銀行券），由臺灣銀行印製臺幣；光復後臺銀繼續運作，舉凡繳學費、使用生活費、交易買賣之類的，流通的錢都跟戰前一樣，所以在臺灣一直都是使用臺幣，差別只在沒多久（1946）便改用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臺幣（指舊臺幣）。

說到一些日本人被臺灣人「虐待」的新聞，在戰後就開始出現了。回想在軍中，少不了有日本人，而且日本學生同樣要當學徒兵，一律平等，誰都逃不了兵役，然而臺、日民族相處在一起，日本人都專門欺負臺灣囡仔，我進一步感受到日本人的無理。例如「喂，老兄，借一步說話，來後面一下」，人被帶走就揍一頓了，看你不順眼就要你去旁邊接受制裁。和平之後，臺灣人出頭天啦！像我回到學校，日本囡仔最好別來上課，來了就換

10 玉音放送，指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廣播放送昭和天皇所頒布的《終戰詔書》（大東亞戰爭終結ノ詔），向日本國民宣布停止對外戰爭，表示接受同盟國《波茲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願意無條件投降；未幾，《終戰詔書》亦刊載在新聞報紙上。「玉音」是對天皇聲音的敬稱，惟昭和天皇並非在廣播現場親自宣讀《終戰詔書》，乃頒布前一日預先錄成唱片，當日再放送。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7 日，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

他們去教室後面一下，兩、三個臺灣人對付一個日本人，修理到他叫不敢，跪著求饒，乖乖地不敢反抗，因此大部分日本學生都不敢來學校，少數幾個註死（指註定倒楣）出現的，就淒慘了。

新政府開始派人接收（1945年10月25日）的那段時間，有什麼好壞情狀，很多人都講述過，我就不多講了。我親身經歷的是，初期新政府在西門町的臺北公會堂辦活動大會（受降典禮），我有參加，在場會眾都說「我們光復啦、祖國啦」等等的口號，大家都嘛很興奮，想不到政府軍隊遊街，竟是揹加薦（kuānn ka-tsi，拿著提袋）、揹扁擔，一副土匪像貌，相較於日本兵，再怎麼戰敗仍保持軍人姿態，制服整潔，穿著很筆挺，任誰一看都不知道該說什才好，輸給那樣的中國兵，實在很冤枉。

復學以後，校方師資暫時仍由日本人擔任，教到學校有足夠的中國人教授為止，差不多一整年我們都繼續受日本教育。光復後也開始學北京話，但其實日本時代學校就有在教了。戰前臺北高商一個年級分成兩班，一個是英語班，一個是那時稱為「支那語班」的中國語班，所以戰後那些日本老師繼續留下來，我一上課就學得到中國話，不用等到中國老師來了才學。至於住處，我住母舅郭再強¹¹的家裡，在中山北路2段128巷內，附近就是臺

11 郭再強（1906-1978），臺南麻豆人，日本大阪商科大學（今大阪市立大學）高等商業部畢業。曾任臺南州曾文郡直轄聯合街壯丁團長、臺南州內務部教育課社會教育書記等職。戰後，為臺北一德公司代表人、佳里大洋針織公司董事長、麻豆東隆針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友人吳新榮被政府羈押，郭氏為保釋人之一。著有《漫談麻豆社古今》。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20年7月18日，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曾文郡壯丁團員の兵器獻金〉，《臺灣

灣水泥。阿舅留學日本，從日本的大學畢業，以前在日人商社服務，也曾返臺當公務員，日子算很好過的。戰爭期間他就來臺北了，在中山北路買下一間很大的宿舍。



【圖 5】周登龍升大學考試時期

資料來源：周登龍提供。

周美里：舅公郭再強這個人很有意思，他是一位士紳，寫過《麻豆志》，¹² 對麻豆人物、地方掌故都很有研究。另外，李筱

日日新報》夕刊，1932年12月23日，第2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7月18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郭再強周一塵明飛往新加坡 陳球溥今自香港返台〉，《經濟日報》，1971年7月29日，第9版。

12 指《漫談麻豆社古今》，副標題「兼述我的回顧與所感」，由郭再強編述，1975年自印。該書於1972年開始撰著，包含麻豆之沿革、史事、教育、宗教、藝文、風俗、治安、產業、財經、交通、人物、團體等。參見《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一種方志類（九）》（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

峰教授也是我們家親戚，他叫我表妹，因為他的阿嬤跟我外嬤是姊妹，都姓林，我們彼此是姨表關係。再一位有名的親戚是林秋梧，¹³ 革命和尚，這也是為什麼李筱峰會寫林秋梧傳，他在序裡面就提到我外公，說他去訪問我外公關於林秋梧的事情。¹⁴

不過，儘管社會秩序還算穩定，戰後的經濟就不行了。那時候的臺灣，是大家很窮，很多人都變貧民了，因此關心現實的人，很難不是左派，也一定會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當時讀馬克思

1997)，頁 169-177。

- 13 林秋梧（1903-1934），法號證峰，臺南人。1918 年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1922 年，因有該校學生與日本警察就交通規則起爭執，引發「北師事件」，林氏在事件中遭牽連而被退學。1926 年加入臺灣文化協會活動寫真部、文化演講，並發行兼編輯《赤道報》。1927 年出家為僧，師承開元寺住持得圓和尚，該年 4 月入日本駒澤大學。1930 年學成歸途時旅行朝鮮，視察各地佛教；5 月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9 月任開元寺教師兼書記；12 月兼任南瀛佛教會講師。1934 年，擔任臨濟宗布教講習會講師兼翻譯。著作發表於《中道》、《南瀛佛教》、《臺灣新民報》、《赤道報》等刊物。參見釋慧嚴，〈林秋梧〉，「線上臺灣歷史辭典」，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4 日，網址：<http://140.109.184.148/Default.aspx?2>。
- 14 林秋梧有四妹（林秋燕、林秋岑鳥【要造字】、林秋鶴、林秋鶴）、二弟（皆夭折），其中兩個妹妹分別嫁給郭祿雨（周登龍之丈人、周美里之外祖父）、李步雲（李筱峰之祖父），因此周登龍之妻與李筱峰之父為姨表兄妹（姊弟），而林秋梧即周美里的母系舅公、李筱峰的父亲舅公，則周美里、李筱峰是更下一代的姨表兄妹。又，李筱峰編著的林秋梧傳記歷經 3 次出版，分別有《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臺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臺灣革命僧林秋梧》（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1）、《台灣革命僧——林秋梧》（臺北：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唯有第一次出版的序言提及郭祿雨；而後兩個版本，則是新史料出土後，李筱峰再重新整理，先由《自立晚報》付梓，後於望春風出版社再版。

主義，會覺得很有吸引力，尤其對於散凶人（sàn-hiong-lâng，貧苦人）更是如此，可以說許多人都去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從中找尋希望。而我們讀經濟學，對社會又多少有所關心，同樣也被馬克思主義「迷去」，認為「資本主義的富有人家都在剝削貧民的血汗」，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一。

那麼，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資料來源在哪裡？我早期的知識素養都是從日本書籍來的，戰後初期讀的經濟學也是日文，所以是從日文的馬克思主義開始讀，就這樣被迷去的，卻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如此。這些思想不見得要由學校老師介紹進來，況且那些日本教授也是傾向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比較多，我們學生會自行去讀馬克思主義。相關書籍，有的是日本時代即引進臺灣，有的則是戰後日本人要走了，留下很多東西，他們不能帶走，遂在街仔路（ke-á-lōo，街道）擺地攤拍賣，我就去買便宜的書來看。書籍很多，裡頭就包括相關的書，或者有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

只是老實講，我是無膽的人，從頭到尾我都沒有勇氣採取行動，加入共產黨或相關組織，那要殺頭的嘛。也不保證勢必會出頭天，自己又非野心家，所以任何危險的事情我都不接觸，不參加社團、不參與遊行，頂多思想上信仰馬克思主義。在臺北高商時期，我沒什麼機會認識外省朋友，多是結交臺灣人，但有兩、三個朋友後來竟成為共產黨員，相信將來是他們的天下，一位是曾群芳，¹⁵ 他既是我臺北高商的同學，戰前我被徵召當學徒兵的

15 曾群芳（1928-2020），苗栗竹南人。戰後，因不滿國民黨政府失政，1947年受鄭文峰影響而參加中國共產黨在臺組織，任臺北市工作委員會委員，接受郭琇琮指揮；另擔任第五街頭支部委員，協助高懷國發展工

時候，他也跟我編在同一分隊，兩人朝夕相處。本來依我的認知與印象，曾群芳應該是個很「無膽」的人，後來聽到他也參加共產組織，大家都嚇一大跳，我想當年他會去參加，應該也是追求一個理想。再一位是鄭文峰，¹⁶ 忽然中途失蹤、跑路了，便沒有

作；並參與學生工作委員會臺大法學院支部工作，及《光明報》之油印、發行。1948年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專科畢業，服務於臺灣糖業公司，從中調查各地糖廠資料。1949年，擔任黃華昌中共地下黨之監誓人。1950年開始逃亡，時為臺糖花蓮糖廠職員。1951年向國防部保密局自首，雖免繫獄，然仍長年受政府監視。曾入職大同公司，1960年代任財務處副處長，1970年代任財務處處長，及臺北市會計學會優秀會計人之評審委員。後轉職至華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董事長。1982年，當選中華民國關稅協會理事。參見曾建元，〈曾群芳同志的故事〉，「大紀元」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31日，網址：<https://www.epochtimes.com/>；「臺灣法商學院同學通訊錄」、「補呈台灣地區在逃通緝總名冊」，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9200000Q/0038/9999/17/1/001、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8/087；〈企業財務主管研討會〉，《經濟日報》，1969年11月15日，第5版；〈中小企業廠長訓練 訂定二十八日開訓〉，《經濟日報》，1971年4月25日，第6版；〈第一屆優秀會計人揭曉〉，《經濟日報》，1973年2月15日，第6版；〈三屆 優秀會計人選拔 受理報名〉，《經濟日報》，1975年4月8日，第7版；〈關稅協會改選 周時鍊當選理事長〉，《經濟日報》，1982年3月9日，第9版；林嘉男，〈追思我的人生導師曾董事長群芳先生〉，「超訊」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31日，網址：<http://www.supermedia.hk/>。

- 16 鄭文峰（1929-1950），嘉義朴子人，1947年畢業於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專科。曾任太平初級商業學校（今已併入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員。據官方資料載，1947年6月鄭氏由陳炳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1948年任臺大法學院支部委員兼小組長，吸收、領導黨員葉金柱及邱媽寅等，受命調查糖廠組織與農民情況，建立武裝小組，未著手即於1950年6月遭逮捕。同年9月被判處死刑，11月29日槍決。參見「李水井、黃師廉等叛亂案」、「臺灣法商學院同學通訊錄」，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340、A309200000Q/0038/9999/17/1/001。

從臺灣大學大學部畢業，無奈終究被抓到。據我所知，鄭文峰這個人從未失志，堅持理念到底，不像有的人一被逼供就攤牌，卻也由於他始終嘴硬，不願提供情治人員任何訊息，就被槍決了。有的人或許不得不自白，這樣子才能救自己一命。還有一位和我很好的同學王明德¹⁷，他是市議員王世堅¹⁸的爸爸，年輕的時候，我跟王明德幾乎每天都相處在一起，因為他家住雙連，我住母舅家，都在中山北路上，兩家距離也很近，平時我們都會一起讀

17 王明德(1929-2008)，臺北人，1948年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專科畢業，曾服務於臺灣人壽保險公司。據官方資料載，王明德於1948年1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組織，隸屬成功中學支部，由另一北平人王某領導，經常開會，並將《光明報》寄給女友，然未做實際工作。1949年8月，王明德在戶口檢查時被警方扣押，未幾送至國防部保密局。同年11月，判處交付感化。嗣後，王明德轉往金融界服務。參見「臺灣法商學院同學通訊錄」、「調查局編印——台灣光復後之『台共』活動」、「陸有勝等匪謀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9200000Q/0038/9999/17/1/001、A80300000A/0036/340.2/5502.3/5/002、A305000000C/0038/1571.2/7421；〈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收於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臺北：國家安全局，1961)，頁1-9；張奕惠，〈又一個不怕死的〉，「今周刊」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首揭辛酸秘辛！王世堅：11年前跳海「父親已在醫院彌留」〉，「Newtalk新聞」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s://newtalk.tw/>。

18 王世堅(1960-)，臺北人，文化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碩士。曾任江鵬堅競選立委總幹事、二二八和平促進會執行長。1995年參與創辦台北之音廣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任反對中國併吞大會副召集人，1998年當選第八屆臺北市議員，連任至第九屆(2005年止)，2000年出任《自立晚報》董事長。2005年，當選第六屆立法委員；2010年再當選第十一屆臺北市議員。參見「臺北市議會」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www.tcc.gov.tw/Default.aspx>；「立法院」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s://www.ly.gov.tw/Home/Index.aspx>。

書、上學。王明德加入共產黨後，並不怕大家知道，那時候共產黨員是要被殺頭的，加入者都嘛很秘密，只有他敢跟我們告知，而且氣勢很狂，炫耀他今天去開會，會中談到什麼「光明的日子到了」、「我們解放的日子快到了」，或者「將來不久的日子，臺灣一定會解放」之類的，就這樣直接講給我們聽。他還不時拿《光明報》¹⁹ 秀給我，這一份刊物是基隆中學在印的，那間學校從校長、²⁰ 教務主任²¹ 以下的教職員，很多都是共產黨員，於是

19 《光明報》，乃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之油印半月刊，用以宣傳中共。由基隆中學支部印製，1948年秋天開始發行，至1949年8月光明報案破獲為止，已出版21期。參見「調查局編印——台灣光復後之『台共』活動」，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A/0036/340.2/5502.3/5/002；〈匪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叛亂案〉，收於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1-9。

20 指鍾浩東（1915-1950），高雄美濃人，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肄業。幼習漢文，好讀魯迅、巴金等人作品及《資本論》。日治時期因不滿日本人統治，1940年與表弟李南鋒及其妻蔣碧玉等人赴上海，經香港轉往廣東惠陽；然因「漢奸」嫌疑被捕，經丘念台保釋獲救後，任職於第七戰區東區服務隊。中日戰爭（1937-1945）末期，目睹國民黨之腐敗，思想日漸左傾。1946年返臺，經詹世平（吳克泰）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基隆中學校長。二二八事件後，鍾氏成立基隆中學支部；1948年出版地下刊物《光明報》；1949年成立基隆市工作委員會。1950年8月被捕，同年10月14日遭槍決。參見沈懷玉，〈鍾浩東〉、〈基隆市工委會案〉，「線上臺灣歷史辭典」，下載日期：2020年9月4日，網址：<http://140.109.184.148/Default.aspx?2>；「鍾浩東等」，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39/273.4/481。

21 指方弼（1912-1951），廣東惠來人。據官方資料載，方弼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1935年返粵，任普寧泥溝鄉小學校長。1937年發生中日戰爭，方弼由廣東省立第四中學同窗陳紹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屬張珂敏領導，並在普寧青年抗日同志會二區分會做宣傳工作。1938年，依中共指示擔任二區中學教員，受鄭敦領導，乃青抗會宣傳股負責人。

把學校當做《光明報》的發行地。而王明德也被抓了，關幾個月才出來，我們不知道他花掉多少錢來處理，但難免也有少數人認為他可能坦白了，才能救自己一命。

更奇怪的是，我固然熟識王明德、鄭文峰、曾群芳等人，尤其最常跟我在一起的就屬王明德，可是都沒有人吸收我進共產組織，他們只一味地誇獎我這個人思想進步，並在我面前批評國民黨是反動分子。也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先，我已經受傷了，而《光明報》被破獲在後，所以很多人都是我之後，於 1950 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被抓、被殺。

1939 年，與鄭敦等人員意見不合，方弢被開除黨籍；同年前往梅縣南口中學，充任教導主任。1941 年至廣西，任興安小學、博白中學、興業國民學校、貴縣第二中學、桂平國民學校等校之教員。1946 年 8 月，與妻張奕明一同來臺，經南口中學舊同事鍾國輝引介，二人被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聘為該校教員；1947 年，方弢升為教務主任。1949 年 9 月被捕，遭指控 1937 年加入共產黨組織，擔任宣傳股長，後與共產黨人員不合，旋即來臺，任教基隆中學時，知其妻張氏及鍾浩東為共諜，屢被約參加活動，惟均予拒絕。1951 年 8 月，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褫奪公權 10 年；同年 9 月，一度減至有期徒刑 5 年，褫奪公權年限不變；至 10 月，總統蔣介石認為應判處死刑，乃指控方弢因屬同事而不檢舉其妻及鍾浩東，欠缺自身脫離共產黨之證明，亦未向政府辦理自新，及聽從鍾浩東等邀約參加叛亂工作；同月確定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1951 年 11 月 3 日被槍決。參見「蔡堯山等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40/273.4/169；〈昨晨執行槍決〉，《聯合報》，1951 年 11 月 4 日，第 7 版；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下載日期：2022 年 7 月 25 日，網址：<https://twjtcdb.nhrm.gov.tw/>。

經歷與影響

事件中橫遭槍傷

關於我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應該要從 1947 年的 2 月 27 日開始算起。我們是「無膽」的老百姓，雖然當天有聽到動亂的消息，可是都沒有想要出門看個分明，例如有人被查緝私菸、有人被開槍打死、有民衆去公賣局抗議等等消息，這些事我們都聽說了，就是不敢多管閒事，很快地政府宣布戒嚴（2 月 28 日），就更不敢上街。那時候剛好學校放寒假，²² 從中南部來讀書的學生都已回故鄉了，一時還沒來學校，我的很多同學也一樣，偏偏我還住在臺北的母舅家，沒有回臺南中營，結果就歹運遇到那種事情。

真的沒想到情況會愈來愈嚴重，3 月 8 日軍隊登陸基隆，開始一路打進臺北，9 日臺北隨即再次戒嚴。就是因為這樣，整條中山北路都出現兵仔搶劫，很多人被劫掠，並造成死傷，像母舅家後面有一間洗衫店，頭家（老闆）不知爲什麼跑出來，無緣無故在路邊被打死。原本我們不知道有發生這件事，我也不清楚洗衫店頭家叫什麼名字，是他女兒跟我表妹郭惠美是國民學校同學，我們才曉得那個頭家也被打死。還不只這裡，民權東路的中

22 此或有待商榷。據當時新聞載，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大學曾停課二週，且臺大學農學院與臺灣省農林處農業推廣委員會合辦之家畜防疫講習會，已於 1947 年 2 月 26 日行開學典禮，可見臺大已在事件發生前即開課。參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下載日期：2020 年 8 月 27 日，網址：<https://contentdm.lib.nccu.edu.tw/digital/collection/228twnews>。

山國小以前有一位教導主任，²³ 也被殺害，當時的情況可以說是看到男人就要打殺。

我的事情發生在3月10日早上11點左右，而且我母舅家同樣被打劫了。我們以為出去外面不好，可是待在家裡也沒有好到那裡去；因為我們就是顧慮到安全才不出門，又覺得自己沒有做壞事，便敞開門窗，剛好讓那些兵仔擅自闖進來，差不多有5個人。我們很單純，什麼都不懂，想說隨便他們看，反正我們是清白的。那些人進來沒有脫鞋，我們也不敢有意見，只會講「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表示我們不清楚，更沒做過壞事。然而，他們的行動有夠奇怪，たんす（箆笥，櫃子之意）、屨仔（thuah-á，抽屨）不分大小，一個一個都開起來看，我們本來以為是要抓壞人，可是越看越奇怪，怎麼會變成翻箱倒櫃呢？他們竟然在搜索財物，有的櫥櫃是上鎖的，還命令我阿姪（a-kīm，舅媽）郭陳梅打開，不照著做還不行，畢竟他們荷槍實彈。我們終於明白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來搶東西，他們至少拿走了新的洋服、阿姪的珠

23 指何嘉琅（1902-1947），臺北板橋人。1923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任板橋公學校（今板橋國民小學）訓導，1936年任臺北日新公學校（今日新國民小學）訓導。戰後，轉任中山國民學校（今中山國民小學）教導主任。二二八事件發生後，3月10日晚上，何氏認為情勢太亂，部隊又駐紮校內，因而留校陪同女老師輪值。翌日中午，與駐軍警官一同離開學校，於中山北路口遭士兵攔阻，何氏遂被強行押至今晴光市場前殺害。日後家屬猜想死因，可能當初軍隊進駐校園，把教室桌椅當柴燒，何氏曾加以攔阻並向教育當局反映，引起駐紮部隊不滿，因而受難。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7月27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年9月6日，網址：<https://228.drnh.gov.tw/index.php>。

寶、現金、カメラ（camera，照相機）等，那些東西比較值錢。

這一天我阿舅去上班，他在中山北路開貿易公司，留在家裡的成人只有阿姪跟我，剩下的是阿舅、阿姪的孩子。我那些表弟妹最大的是郭哲舟，當時讀國民學校六年級，中間還有讀五年級的郭惠美，郭貴美再小個兩、三歲，其次是郭久美、郭奈美，最小的表弟郭鵬鯤才出生滿月。講實在的，我們一點警戒心都沒有，可是想要防範、應變也不曉得怎麼做起；他們要離開屋子的時候，我跟阿姪兩個人呆呆地站在門口看著他們，沒想要幹嘛，突然他們裡面有一個人轉身，「砰」地一響，向我開了一槍，什麼預告都沒有。其他的兵仔身上都帶著一包一包的裝備，唯獨朝我開槍的那個人一身輕裝，拿一隻手槍而已，我猜他可能是隊長。我也在想，應該就是看我是成年男子，以防我追出去做什麼事，他才要開我一槍；二二八事件期間，那些軍警在街上打殺的也都是男性，婦女較少受到傷害。這些人根本沒什麼正當目的，遇見民衆就想攻擊，在街上看到人更是如此，只爲了報復，或者把人民視爲「叛亂分子」，以致打殺得很高興，甚至當做趣味，一點罪惡感也不會有。

那個帶頭的對我開槍，看我中槍以後，跟其他人頭也不回地就走了。說起來我是壞運，但也是好運，因爲子彈貫穿過左胸，射進我後方的浴室，彈頭沒有卡在體內，否則彈頭造成體內發炎，代誌就大條了。況且彈頭也沒有傷到重要血管、動脈或心臟，可是子彈路徑若下方一點，打中的就是心臟。所以，一中槍的剎那間，我並不曉得自己受傷，一點知覺都沒有，還想說那個人怎麼雄雄（hiông-hiông，突然）對我開槍？之後我低頭，掀開衣服望著胸口，才發現左胸一個洞。那時候我還是沒有感到疼

痛，也沒有流血，只是領悟到自己中槍罷了；漸漸地，血才勻勻仔（ûn-ûn-á，緩緩地）滲出來，並非濺得到處都是。也因此，在電影裡看到人中槍後，血就大量噴出來，那都是假的，爲了效果而誇大，除非中的是心臟、大動脈，才會馬上血流不止，這是我實際中槍後的體會。

子彈穿過我的身體，僅造成輕微槍傷，不過當時誰能保證一定有驚無險？加上子彈會旋轉，前胸擊中只是一個小洞，可是彈頭從我後背鑽出來，背部的傷口就比較大。見此情景，我們真的是過度驚嚇，以爲很嚴重，我更害怕自己死掉，所以急著想送醫急救。無奈外面仍是戒嚴中，兵仔還在大肆打殺，大家處在悲慘的恐懼中，感受到戒嚴的可怕，都不敢出門，因此家人很猶豫，沒有馬上送我去醫院。當天下午，我母舅趕回來家裡，我也變成血流不停，終至昏迷倒臥血泊中，幸好有賴阿姪幫我急救。以前日本政府會要求每戶家庭在戰時都得準備急救箱，阿舅家裡也有，阿姪就幫我消毒傷口、打止血針。現在想來，傷口沒有太大，不算重傷，或許用不著打止血針，緊按傷口也能止血，不過我至今仍然非常感謝阿姪爲我做的一切。

中槍隔天（3月11日）的早上，見局勢似乎平穩一些，母舅家對面有一間運送店，家人就請他們用搬運貨物的リヤカー（兩輪拉車）送我到鄰近的馬偕醫院，住了一個月。就是在治療期間，才明白我的運氣有夠好，不僅重要的血管、動脈沒有受傷，左胸彈孔離心臟竟只差2公分，差一點就喪命了。中槍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可是在那種恐怖的氣氛下，除家人探病外，幾乎沒有人敢理這種事。例如原本有一個同學也跟我很好，幾乎每天都跟我玩在一起，在我被槍打傷那一天，我躺在母舅家裡奄奄一息，

他正巧來找我，在門外探頭探腦的時候，我們對面鄰居跟他講：「你朋友（指我）被槍打中了。」沒想到他一聽就嚇得趕緊走，鄰居也傻眼，想說怎麼會有這種朋友，至少也該進門關心一下啊。這是日後他們跟我們講的，真是什麼款的人都有。例外的是倪克昌，²⁴ 只有他敢來探望我，真是憨直的好朋友，一聽到消息就趕來醫院，我住院一個月，他也來看我好幾次。見我已無大礙，躺在病床上無聊，還帶書給我看。

後來我出院，回到學校讀書，由於我有向學校請假，以致很多人都知情，但也不敢問我。我同樣不喜歡人家提這件事，自己更不想講，因為我感覺得到，澄清是一回事，別人怎麼想又是另外一回事。無論說與不說，搞不好他們已經認定，我之所以中槍，應該不是單純受傷吧，可能真的有參加什麼武裝隊伍，跟人家「拼搏」，才搞成這樣子。日後，有一個也知情的朋友，聚會場合還不時地跟我開玩笑，說我槍傷有一個洞，不曉得抽菸時煙霧會不會從那個洞冒出來？我這槍傷老早就痊癒了，只是肋骨猶有鋸齒狀傷痕，照 X 光檢查都還明顯可見，胸前、背部也留下傷疤。

二二八對我的影響

我在二二八受害，第一個影響就是專科畢業後的工作問題。中槍時我還是商業專修科二年級學生，只不過學校已經併入臺大法學院；出院後我繼續讀書，商科總共要讀 3 年，於民國 37 年

24 倪克昌，臺北人，1947 年畢業於臺灣省立法商學院（時已併入臺灣大學法學院）東亞經濟科，曾任職於中華國貨公司。參見「臺灣法商學院同學通訊錄」，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9200000Q/0038/9999/17/1/001。

(1948) 畢業。那時候，臺大法學院的訓導分處主任蔡章麟²⁵ 會介紹頭路 (thâu-lōo, 工作) 給畢業生，他是鯁鯁出身的法學專家，很熱心，後來當上大法官。商業專科學生的出路首選是銀行、其次是國營事業。而戰後臺灣的行庫有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彰化銀行，這是首選；第二個選擇是國營事業，最大的是臺糖，另有臺鹽、臺泥、工礦公司、農林公司。他主要介紹學生進去這些地方工作，並且按照成績安排，第一名到第四十名可以進去五行庫，其他二、三十位畢業生則可入職五大公營公司。等於商業專科畢業生在畢業前學校都已經介紹工作了。

當時我的成績還不錯的，可是我等候一、兩個月都沒消息，到了畢業那年的二、三月，蔡章麟才找我去講話。他一開口就說很抱歉，我不懂他在抱歉什麼，然後他繼續說，指出我畢業排名

25 蔡章麟 (1908-1988)，臺北萬華人。臺北高等學校文科畢業，後赴日深造，先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及大學院，1932 年通過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試，1934 年獲東京帝大法學碩士學位，亦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1935 年起歷任日本青森、高知、神戶、大阪等地方法院推事，及大阪高等法院推事、大阪地方法院庭長等職。戰後，任大阪華僑聯合總會顧問。1946 年返臺，隔年起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法制委員會委員、臺灣省政府法制室參議、司法行政部法專門委員等職；並於 1948 年起擔任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法學院訓導分處主任。1950 年，兼任司法行政部參事、專門委員。1952 年，成為行憲後司法院第一屆大法官；1970 年任監察委員。此外，曾擔任司法行政部法規整理檢討委員會委員、司法院顧問、公務員甲等特考典試委員、大同工業職業學校校長、成功中學同學會理事長、臺北市柯蔡宗親會名譽理事長等職。著作有《論誠實信用的原則》、《民法債編各論》、《民事訴訟法 (上下冊)》與《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等。參見《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頁 51-53。

是第二十三名，只是遲至現在都沒介紹職業給我，不過他有好朋友是臺灣人，在經營一間小的金融公司，即「臺灣合會」，²⁶ 可以讓我去那裡工作，不知道這樣的安排好不好？蔡章麟不敢講明，但很快地我就曉得他對我抱歉的理由，以及他強調「臺灣人所經營的」是什麼意思。正是因為公家單位很多職缺都被中國人或跟國民黨有關係的人占走，否則就是需要背景清白的臺灣人才能去，只要你跟「暴動」、「叛亂」有一點點關係，無論到底發生什麼事，你註定要列入黑名單。而我被牽涉到二二八事件，有這層關係的人便不能進去國營事業或銀行，蔡章麟也不敢介紹。

原本我是受害者，遭闖入家中的國民黨軍隊槍擊，可是事後竟開始被政府登記資料。政府才不管我是什麼理由受傷，反正中彈了，我就跟二二八事件有關係，很可能我是叛亂分子，不然怎麼會中彈？別人都沒事，偏偏只有我受傷，一定是因為我有做什麼壞事。而合會就是現在的中小企業銀行，後來才升格的，由臺灣人經營，經營者又是蔡章麟的好朋友，比較不忌諱，我才得到工作。當我想通整個來龍去脈，不免感到無奈且沒辦法，原來二二八不只有讓我身體受傷的問題而已，還會影響我的未來。現

26 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為 1915 年創立的臺灣無盡株式會社、大正無盡株式會社。1920 年，臺灣無盡為臺灣勸業無盡株式會社購併，1926 年大正無盡改組成臺灣南部無盡株式會社。戰後 1945 年，兩會社與東臺灣無盡株式會社、臺灣住宅無盡株式會社均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1946 年合併為臺灣無盡業股份有限公司。1947 年，復與常盤土地株式會社合併，更名為臺灣省人民貯金互濟股份有限公司。1948 年再更名為臺灣合會。1976 年，改制為「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參見「臺灣企銀」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1 日，網址：<https://www.tbb.com.tw/>。

在再回想，雖然撿回一條命，但從此被烙印成「特殊分子」，更可以說是影響我的一生，改變了一生的命運等於整個人生都受到傷害。

我在臺灣合會上班半年就離職，決定插班讀大學，1949年考進臺大經濟系，²⁷再讀了3年才畢業，那時候已是中國教授在教書。印象比較深刻的同學中，一個同學是楊鴻游，²⁸早期很有

27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其前身為臺 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經濟學講座，創立於1928年。戰後，文政學部改制為文政學院，1946年分離為文學院與法學院，法學院下設經濟、法、政治等3個學系。至1999年，法學系分立為法律學院，法學院亦改為「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隨而改隸之。參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9月2日，網址：<http://www.coss.ntu.edu.tw/Default.html>；「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9月2日，網址：<http://www.econ.ntu.edu.tw/>。

28 楊鴻游(1927-)，彰化埔心人，1948年自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專科畢業，曾任教於開南商工學校(今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後就讀臺大法學院經濟學系，1951年畢業(畢業年度1950年)，學士論文〈台灣專賣論〉，指導教授為張漢裕。1952年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國進修。1954年，任臺北市政府秘書，1957年轉職至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1965年，出任美國花旗銀行(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臺北分行副理。1971年，參與創辦臺灣第一信託公司(今已併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擔任常務董事；同年升為花旗銀行臺北分行總經理。1973年擢升花旗銀行駐中華民國副總裁，隔年再升為總行副總裁。1975年底離臺赴美，長居國外。曾轉赴香港發展，任星港地產公司執行董事；1998年任亞洲信託公司常務董事。參見「臺灣法商學院同學通訊錄」，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9200000Q/0038/9999/17/1/001；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檢索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網址：<http://ci59.lib.ntu.edu.tw/BachelorAS/>；〈北市工務局長 楊金章將繼任〉，《聯合報》，1954年6月3日，第3版；〈充滿信心的楊鴻游〉，《經濟日報》，1975年8月12日，第12版；〈花旗台北分行 明天開幕典禮〉，《聯合報》，1965年2月14日，第5版；〈台灣第一信託投資公司 昨開成立大會

名，是第一個在外商銀行當高階主管的臺灣人。楊鴻游和我是商科時代的同窗，戰前我們當學徒兵也在同一部隊。商科畢業時，他的成績是前五名，學校自然介紹他去臺灣銀行，偏偏他不就職，反倒一面回去他的母校開南商工（今開南高級中學）當老師，一面插班讀臺大經濟系，更是成為我的大學同系同學。當初他就是準備要留學美國，大學畢業不久即考上公費留學，讀哥倫比亞大學，是跟高玉樹²⁹同期赴美的；所以，高玉樹當臺北市長時，他就當市長的英文秘書。回國後，楊鴻游最大的成就是擔任

選舉董監事》，《經濟日報》，1971年5月4日，第6版；〈花旗銀行台北分行〉，《聯合報》，1971年9月2日，第5版；〈楊鴻游和花旗銀行〉，《經濟日報》，1973年3月23日，第6版；〈美國花旗銀行 楊鴻游獲晉升〉，《聯合報》，1974年3月25日，第6版；〈首家台資銀行登陸，財部無法約束〉，《聯合報》，1993年5月20日，第6版；〈亞洲信託公布去年營運成果〉，《經濟日報》，1998年5月28日，第42版。

- 29 高玉樹(1913-2005)，臺北松山人。臺北工業學校(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器工程科畢業，1933年赴日，任海軍航空本部等處之技術顧問。1938年就讀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機械工程科，畢業後任中島航空會社等處任之工程師。戰後，任東京臺灣同鄉會副會長，協助神奈川高座軍工廠臺灣少年工返鄉。1946年，因戰犯嫌疑被押解至上海，拘留92日獲釋，始得返臺，乃從事五金買賣。1950年當選臺北市商會總幹事，隔年考取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Mission to China)美援技術協助計劃舉辦之留學進修，赴美一年，學習冶金技術與工業經營。返臺後，擔任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技術顧問，1954年當選省轄市臺北市市長。1960年，參與成立中國民主自治研究會，並與雷震等人籌組新黨，惟組黨運動遭政府打壓，高氏亦受法院4次偵訊。1964年，二度當選臺北市市長。1967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為官派首任市長。1972年起，歷任交通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資政、國家統一委員會副主委。著有《高玉樹論著選集》4冊。參見《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頁26-28。

臺北的花旗銀行總經理，不過聽說後來發生事故，³⁰ 他就跑去紐約。

此外，和我大學同屆的尚有一個臺灣知名人物，但他是政治系的，就是林洋港。³¹ 而郭婉容³² 則是我經濟系的學妹，差我

30 相關報導可參見〈花旗銀行台北分行前任總經理 楊鴻游涉嫌套匯百萬美元〉，《聯合報》，1977年5月11日，第3版；〈空殼子銀行無信用·早有記錄 中信局竟接信用狀·令人納悶〉，《聯合報》，1983年9月7日，第5版。

31 林洋港(1927-2013)，南投魚池人。1952年自臺灣大學法學院政治系畢業(畢業年度1951年)，學士論文〈民主政治之基本原則〉，指導教授為陳國新。曾任臺南市稅捐處稽查員、南投縣政府民政局局長、臺灣省政府秘書處秘書、中國國民黨雲林縣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67年當選南投縣縣長，1971年任省政府建設廳廳長，1976年任官派院轄市臺北市市長，1978年任省主席，1981年任內政部部长，1984年任行政院副院長，1994年任司法院院長，1996年任總統府資政。參見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檢索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網址：<http://ci59.lib.ntu.edu.tw/BachelorAS/>；「行政院」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https://www.ey.gov.tw/Index>。

32 郭婉容(1930-)，臺南人。1953年自臺灣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畢業(畢業年度1952年)，學士論文〈亞丹·史密斯的自然主義與學觀主義〉，指導教授為趙蘭坪。1953年起歷任臺大經濟學系助教、講師、副教授；其間1960年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進修，1966年升為教授。1973年入任行政院，任經濟設計委員會(今已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77年任經濟建設委員會(前身即經設會)副主委，1979年任中央銀行副總裁。1984年，憑著作“The Taiwan economy in transition”，獲日本神戶大學頒予經濟學博士學位；1988年任財政部部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1990年任經建會主委，1993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參見「財政人物索引」，「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網址：<http://museum.mof.gov.tw/lp.asp?CtNode=63&CtUnit=8&BaseDSD=16&mp=1&ps=>；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檢索系統」，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網址：<http://ci59.lib.ntu.edu.tw/BachelorAS/>；〈郭婉容實至名歸〉，《聯合報》，1984年7月18

兩、三歲，光復後考上臺大的，我四年級時，她才二年級左右。至於商科時代出色的同學也有兩、三個，一個是曾文謙，³³ 第一名畢業，以後就進去臺灣銀行，做到副總經理，後來當第一銀行總經理，也是華南銀行的董事長。還有一個在商界較出名的，即許勝發，³⁴ 太子汽車的老闆，並創辦萬泰銀行，當過國民黨中常

日，第2版。

- 33 曾文謙(1928-1999)，臺北大稻埕人。1949年臺灣大學法學院商業專科畢業，初任行政院輸出入管理委員會辦事員，後歷任臺灣銀行辦事員、副科長、襄理、營業部經理等職。1971年獲財政部表揚為財稅金融機構優秀人員，1978年升任臺銀副總經理。1983年，兼任國際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董事，1985年轉任第一銀行總經理，1989年擔任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第三屆理事。1992年升任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1995年轉任華南銀行董事長。另外，亦曾任臺灣省銀行公會理事長、中國國民黨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等職。參見「臺灣法商學院同學通訊錄」，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9200000Q/0038/9999/17/1/001；《續修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頁352-353。
- 34 許勝發(1925-)，臺北人。1948年自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專科畢業，曾服務於華南銀行信託部。1950年代從事青果貿易，當選過臺灣區青果輸出公會(今已併入臺灣蔬果輸出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1960年代開始代理進口日本汽車，1965年創立太子汽車公司。1980年，當選立法院第一屆第四次增額立法委員(連任至1990年)，1981年任臺灣省工業會理事長，1987年任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1988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1990年，籌組萬泰銀行(今凱基商業銀行)，1991年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1993年，參與成立臺灣工商企業聯合會，並出任理事長。參見「臺灣法商學院同學通訊錄」，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9200000Q/0038/9999/17/1/001；〈新任理事長 王諾回當選〉，《聯合報》，1963年6月21日，第5版；〈汽車工業的：新天地〉，《經濟日報》，1967年6月27日，第7版；「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網址：<https://npl.ly.gov.tw/do/www/homePage>；〈省工業會昨開代表大會 許勝發當選理事長〉，《經濟日報》，1981年7月1日，第9版；「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9月

委。

民國 40 年（1951）大學畢業，³⁵ 中槍的遭遇還是讓我沒什麼工作好找，只好去當教員，這又是二二八事件的另一項影響。我在臺南商業學校³⁶ 教書，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在內的學校教職員，一半以上都是臺南一中（前身即臺南第二中學校）的校友，由於很多自己人，加上有朋友介紹我去教書，所以比較沒有問題。然而，民國 40 年代的大學生畢業去當教員，要是我不講，別人都不曉得生活有多可憐。剛到職的時候，月薪只有 150 元，

3 日，網址：<http://www.cnfi.org.tw/front/bin/home.phtml>；〈挑更重的擔走更遠的路〉，《聯合報》，1988 年 7 月 15 日，第 3 版；〈籌組新銀行 ‘幸福’ 先起跑〉，《聯合晚報》，1990 年 7 月 21 日，第 13 版；〈海基會九日開董監會〉，《聯合報》，1991 年 2 月 5 日，第 6 版；「臺灣工商企業聯合會」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3 日，網址：<https://tcci.org.tw/index.php>。

- 35 戰後的學年度，上學期為一年的 8 月至 12 月，下學期為隔年的 1 月至 7 月。周登龍的畢業年雖為 1951 年，實際上需要等到 40 學年度下學期始正式離校，即 1952 年的前半年；因此，自 1949 年入學算起，周氏在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就讀時間為 3 年。又，周登龍在臺大法學院經濟學系的學號是 353325，學士論文〈古典學派三大思想家之生平及其思想〉，由林一新指導。參見國立臺灣大學，「學士論文檢索系統」，下載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網址：<http://ci59.lib.ntu.edu.tw/BachelorAS/>。
- 36 臺南商業學校，即今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該校原為 1919 年創立的臺南第二公學校（今立人國民小學）附設簡易商業學校，1922 年改稱臺南商業補習學校。1931 年變更為臺南商業專修學校，1933 年女子技藝科獨立為臺南女子技藝學校（今家齊高級中學）。1941 年，校名改為臺南專修商業學校。1945 年 12 月更名為臺南市立初級商業職業學校，1948 年改制成市立商業職業學校。1961 年改隸省立，即臺南商業職業學校。1970 年改制為臺南高商。2000 年改隸國立。參見「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7 月 22 日，網址：<https://www.tncvs.tn.edu.tw/>。

房租及三餐就占了 120 元，剩 30 元，住處還只是一個小房間，吃飯也要很省，再來，看一場電影要 10 元，剃頭一次也要 10 元，電影是我的基本休閒娛樂，每個月都要看一場的，剃頭也屬必要花費，最後就剩 10 元。那時候，我的身體狀況不怎麼好，心情也很差，而心情方面是想到自己在二二八受槍傷，嗣後找工作還繼續受事件打擊影響，所以我未去留意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教書只是度日罷了。好在薪水逐年調整，6 年後我離職時已是月薪 500 元，卻由於通貨膨脹，薪水有升，物價更會升，因此教員薪水的購買力依舊沒有什麼改善。

臺南商校位於臺南市區，在健康路、南門路交界處，對面是家齊女中，附近有體育場，於是我在府前路租屋，這裡就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值得一提。女房東是天主教修女，沒有丈夫、子女，她打算收養一個乾兒子，以便將來年老有人能夠照顧她，看我古意老實，就想收我當乾兒子，也對我很好，還介紹我未來的太太給我。我太太是修女親戚的女兒，修女和我太太的媽媽是姊妹關係；當時，我太太還是成大化工系學生，日本時代改過姓名，因為她家是公務員家庭。

修女房東更希望我不只是當她乾兒子，最好是當養子，而且她還可以介紹我轉職去銀行，原來她的表哥正是連震東。³⁷ 只不

37 連震東（1904-1986），臺南人。1929 年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科畢業，曾入職《昭和新報》，後赴中國。中日戰爭期間（1937-1945）擔任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所組長，參與臺灣革命同盟會，並在中央訓練團臺灣幹部訓練班受訓。戰後，為臺北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1946 年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事、臺灣省參議會秘書；1947 年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兼總務處長；1948 年當選國大代表；1949 年兼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土地處處長、臺灣新生報社董事。1950 年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

過修女有一個要求，就是我不能提起二二八事件，別讓人知道我的遭遇。我倒是覺得，連戰家族是半山的國民黨員，又是修女的親戚，跟這樣一群人相處滿困難的，我想壓力很大，心情會不好，就沒當她乾兒子，只有日後娶了我太太。其實，住了一段時間，我也沒再租修女的房子，接下來就聽說她收我太太的一個表弟（我太太大姨的兒子）當養子，臺南商校畢業的，同樣忠厚老實，還曾經是我的學生。正是由於那個表弟給修女當養子，果然畢業後馬上進入臺灣銀行。這表示修女不是說說而已，誰給她當養子，她真的會設法幫忙。但由此可見，我在二二八期間受傷的紀錄跟著我一輩子，若我不妥協，就會遭受打擊。

我還聽說過連震東家裡的一個故事。連雅堂是臺灣名人，單傳一子連震東，另有3個女兒（連夏甸、連春臺、連秋漢），其中連震東的妹妹（連秋漢）出嫁後，他和妹婿黃綺堂、³⁸ 那位修女

員，1953年任該黨第五組主任；1954年起，任臺灣省民政廳長、秘書長。1960年任內政部長，1966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76年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1980年轉任資政。參見任育德，〈連震東〉，「線上臺灣歷史辭典」，下載日期：2020年9月11日，網址：<http://140.109.184.148/Default.aspx?2>。

- 38 黃綺堂（1905-？），臺南人。中國上海 南大學心理學系畢業，曾任 大助教、經濟部特派員；並與連秋漢結縭，為連震東之妹婿。戰後返臺，協助臺中縣政府、臺灣糖業公司之通譯工作；1947年任臺糖潭子糖廠副廠長。1950年代，升任臺中總廠副總廠長，1954年任彰化溪湖糖廠廠長，1955年任臺灣區製糖酒精工業同業公會理事。1961年，出席國際勞工組織大會，為中華民國派任之僱主代表顧問；1965年改任臺中糖廠廠長。後任臺糖協理，1971年退休，同年轉任臺糖董事。參見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輯，《自由中國工商人物誌》（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1955），頁10；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編印，《中華民國工商人物志》（臺北：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1963），頁576-577；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房東的兄哥（跟連震東是表兄弟），這3個人去中國，連震東去重慶，黃綺堂去汪精衛國民政府，修女的哥哥則去滿洲國，一人投靠一邊，分散投資，可說將來世界不管變得怎麼樣，至少都會有一個人有機會，非常懂得設想。事實證明連震東最紅，發展得最好，日本投降時趕回來，當過臺北接收委員，還當上民政廳長、建設廳長，你看他的機運多好。連震東的妹婿就沒發展得那麼好了，他只有介紹黃綺堂去當糖廠廠長。至於待過滿洲國的那位，回臺沒頭路。

所以，現在身家上百億的連家，從以前就很忌諱牽扯到二二八，畢竟會影響發展；而我這種跟二二八有關係的人，就算想要跟他們攀關係，也很不容易。我更不想讓修女為難，縱使事件對我有影響，可是要我刻意壓抑，絕口不講，我還是頗不自在；萬一我成為修女的兒子，與連家有親戚關係，我自己卻又想自在一點，修女夾在中間不就為難了？

後續生涯及感懷

離開教職之後，我在臺南的美軍空軍基地服務過，同樣是先在那裡工作的朋友介紹我去的，這也要拜越南戰爭（1955-

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20年7月18日，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黃綺堂接掌台中糖廠〉，《臺灣民聲日報》，1965年3月2日，第4版；〈李長庚定今返國〉，《經濟日報》，1971年7月14日，第9版；〈國際砂糖價格穩定 台糖上年盈餘 逾一億二千萬〉，《聯合報》，1971年8月19日，第5版。

1975) 所賜。那時候，美軍在遠東最大的空軍基地就是 CCK，³⁹ 位於臺中，美國大型的 B-52 (B-52 戰略轟炸機) 就從清泉崗起飛，因為在戰後那裡有繼續建設，很大很新。臺北則有協防司令部 TDC (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United States Taiwan Defense Command)，總部在中山北路三段 (今改為臺北市立美術館)，這一片美軍用地很大，包括供應站，有的地方後來改成足球場 (今花博公園爭豔館)、新生公園 (指花博公園新生園區)。而臺南機場⁴⁰ 算是舊機場，日本時代就已經建設的飛行場，原是給日本空軍用的，戰後改由美國空軍駐紮，做為修復站。

民國 46 年 (1957)，我轉職到臺南空軍基地服務，進去要辦

39 CCK，即「清泉崗機場」中文羅馬拼音、英譯 'Ching-Chuan-Kang Air Force Base' 之縮寫。該機場於 1936 年落成，原稱臺中飛行場，之後亦稱公館飛行場，以與同在臺中西屯的水滴機場區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成為日本海軍基地。戰後，延續做為軍用，1950 年為紀念中華民國國軍烈士邱清泉，乃將機場改稱空軍清泉崗基地。1955 年，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成立，因美軍進駐、協防之需而大幅度擴建。至 2004 年，水滴機場民航業務併入清泉崗機場，自此後者轉為軍民合用。參見洪致文，《不沈空母：台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臺北：洪致文，2015)，頁 56-60；臺灣省政府，「電臺中縣政府為裝甲兵旅司令部電請將臺中公館改名為臺中清泉崗一案，經呈奉行政院照准，轉希知照」，引自國家圖書館，「政府公報資訊網」，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3 日，網址：<https://gaz.ncl.edu.tw/index.jsp>；「臺中國際機場」網站，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3 日，網址：<https://www.tca.gov.tw/cht/index.php>。

40 臺南機場，1937 年落成，原為民航用途。1940 年，因永康另有民間飛行場 (臺南北飛行場)，臺南機場乃轉為日本海軍之用。戰後，由中華民國空軍接收，兼具軍事、民航兩用途。越戰期間 (1955-1975)，美國空軍亦進駐機場，並有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維修美軍飛機。該機場現仍有空軍臺南基地、民航局臺南航空站共同使用。參見洪致文，《不沈空母：台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頁 66-69、152-161。

通行證，其發行是聯勤總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今已併入陸軍後勤指揮部）在管的，必須交付履歷書、自傳等資料。我很會寫作文，表面文章難不倒我，便將自己對孫中山思想、三民主義的研讀心得都放進去，不但拿到通行證，還受到注意。有一日臺南的聯勤某長官找我談話，還誇獎我這個人很有學問，並且關心我最近有無從事著述，好在對方不曉得我和二二八事件有關係，可能是因為我不是被關，沒有「前科」，他就不會馬上知道，我也不願意主動講，以免工作又受阻。

換過新工作，確實改善不少，薪水變4倍，有2,000元之多。不過，我的工作內容之一是負責發薪水，就明白自己的薪水跟駐臺的美國官、士、兵是不能比的。當時美金一塊錢可換新臺幣36元，教員月薪500元還不到美金15塊錢，我在美軍基地的薪水雖有2,000元也頂多是五十幾塊美金；而人家20歲左右的美國一等兵薪水就有兩、三百塊美金，一個臺灣大學生都還比不上，月領五、六十元美金已歡喜得要死。更別說美國士官、軍官了，士官平均有五、六百元美金，軍官則是上千元；臺南的美軍基地主官有時是中校階級，有時是上校。這就是當年臺灣的經濟情況，可知有多差。當然，美軍基地的薪水已比一般國內的軍公教好太多，此後一樣有升薪水，不久我的月薪就達到3,000元，平均維持在公務人員的四、五倍或五、六倍。

我在美軍基地待到1975年，一共服務18年，亦即越戰結束了，美軍自越南撤退，臺灣這邊也不需要美軍基地了，之後我就沒有專職工作。不過，在基地工作期間，我跟著人家投資兩間針織公司，這兩間公司都是我母舅開的，他找親戚來合資經營。1960年代到1980年代正是針織事業的黃金年代，有時候生意要

賺錢真的會嚇死人，原初只是資本額 400 萬的公司，因為有賺錢就一直增資，變成資金 5,000 萬，進帳的利潤也很驚人。每年股東紅利最高可分到 100%，最少也有三、四成，真是不得了，足見針織生意有多好賺。所以，我離開美軍基地以後便提早退休，沒有再找正式工作，享受針織公司的利潤就很夠了，而且還當過這兩間公司的董事、監事，也擔任過董事長，光紅利及董、監事的收入就很好過日子。頂多有做股票，或者開公司做一些小生意，可惜都不太成功，好在兩間針織公司有賺錢，我不算太虧。直到 1990 年代，我阿舅這兩間公司才歇業。

也是轉去美軍那邊工作後，我才結婚，薪水較高就有辦法養家，否則教員月薪僅勉強足夠自己生活，哪裡養得起一個家庭？再者，我太太已經畢業了，前幾年她阿姨（指修女房東）介紹我們認識之時，我太太還在讀大學二年級，一定是等她畢業才能結婚嘛。我們育有三女一男，周美里是最大的，最小的是兒子，目前我跟兒子一起住。關於「中槍」的部分，我並不害怕被人知道自己過去曾遭槍傷，我跟太太交往時她就明白了，沒有好隱瞞的，很簡單的受傷過程，也沒什麼故事，兵仔進屋裡搶奪財物，再向你開一槍，如此而已。小孩子同樣很早就知道我受過傷，雖然我沒有特別去講，但也不會刁工掩崁（thiau-kang am-khàm，刻意隱瞞），他們問我就會講。

可是在外面或者去吃頭路，我就不會主動提起自己的二二八經歷，除非是很相知的朋友。那麼，修女房東為什麼會曉得？這是因為她實在很關心、照顧我，有一次講給她聽，她就嚇得叮嚀我不要四處講。我要轉職美軍基地時，她照樣要我別隨便跟聯勤單位談起；不然大家好心幫忙，卻介紹了一個有特殊經歷的人，

這也很困擾。我這種遭遇，有時候想說也沒人相信吧，不是暴徒、沒參加活動，何來惹禍上身？難免有這種聯想。所以，人家要我別亂講，都是爲我好；我想想也有道理，就愈來愈不愛講。

周美里：我們從小就清楚爸爸胸口受過傷，也只是大概知情。在細節上，包括爲什麼會受傷、搶救的過程、發生背景是在二二八期間、時代氛圍……等等，要到高中以後才有聽說。爸爸都沒有主動提起，要我們去問他，他才會講。爲此，我們有幫爸爸申請二二八的賠償金，⁴¹他真的是該被賠償，沒做什麼事就被開槍。

我對於最近的二二八事件平反活動沒什麼瞭解，個人也沒什麼要求，只盼望歷史留下來，有那些紀錄讓大家知道發生過什麼事，這樣就好了。如果要進一步講，我的看法是咱們臺灣人的頭腦太過單純，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曾經短暫戒嚴，⁴²在臺北市的

41 周登龍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20次董監事會之會議上（1997年6月2日）通過補償申請，因傷殘、其他之受難事實，獲25個補償基數。參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9月13日，網址：<https://www.228.org.tw/index.php>。

42 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灣經歷數次戒嚴，既有地方性，也有全臺性，略計如下。2月28日，臺北市戒嚴；3月1日，臺北市解嚴，基隆市戒嚴；3月2日，基隆市解嚴，而高雄岡山戒嚴；3月4日，新竹地區（含桃園）戒嚴。3月6日，高雄市戒嚴。3月9日，臺北市、基隆市恢復戒嚴；3月10日，全臺戒嚴（含澎湖）。至5月1日，中部解嚴。5月2日，臺南市、高雄縣解嚴。至5月16日，臺灣省政府始對全省解除戒嚴令，結束清鄉。參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9月6日，網址：<https://www.228.org.tw/index.php>；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年9月6日，網址：<https://228.dnkh.gov.tw/index.php>；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s://contentdm.lib.nccu.edu.tw/>

中國人住家都大門緊閉，臺灣人則想說兵仔出來幹什麼？應該是要抓壞人吧。還以為門窗都關起來的話，怕被誤會在室內藏匿壞人，反而不關門，表示我們的清白，是光明正大的，這裡並沒有包庇壞人。結果門不關，兵仔就進來了，剛好給他們大肆搜索。

後來我們才明白，中國兵很多都趁戒嚴時機「發財」，凡是想讓自己的兵仔略微好過日，長官就把握局勢不安的情況，利用戒嚴名義，才能出動搶劫。戒嚴正是讓兵仔可以公然搶劫，有一些在臺中國人、從中國回來的臺灣人也這麼講，從前就是如此，有時候軍方還故意施行戒嚴，讓兵仔更有機會公然搶劫。這根本是土匪行為，有些兵仔也的確是土匪出身，只能說中國人有夠厲害，臺灣人卻認知錯誤，實在有夠憨，想不通自己國家的兵，怎麼可能搶自己的人民？相較於日本，日軍是要保護國民的，絕對沒有搶劫群眾之事，可見兩國的觀念天差地遠，我們接受到日本灌輸的教育，卻沒有中國方面的知識。

而一般兇殺案，一定得將兇手繩之於法，可是二二八的加害者要從哪裡揪出來？我的情況還算單純，明顯錯的是朝我開槍的人。問題在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一些人被冤枉抓去拷打、強迫自白，陰影永遠追隨一生，做出這種事的劊子手卻未被求刑，這樣子我們最不服氣。既然發生這些慘事，一定是有人做出來，也就一定抓得出來，那怎麼還沒有下文？看看德國，納粹戰犯逃到南美洲，人家也追緝到南美，而且不論跑到天涯海角，年紀多大，八、九十歲照樣審判，⁴³ 臺灣卻沒有求刑，這是

digital/collection/228twnews。

43 例如舒尼葛拉伯爾 (Josef Scheungraber, 1918-2015)、約翰·德米揚魯克 (John Demjanjuk, 1920-2012)、奧斯卡·葛朗寧 (Oskar Groening,

歷史上很大的遺憾。

像我有一位中學同窗石玉峰，⁴⁴ 後來讀臺大工學院，也是正

1921-2018) 等。舒尼葛拉伯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納粹德國連長，曾派駐義大利托斯卡納；戰後在德國南部經營家具店。2006 年，因被指控其欲報復兩名德國士兵遭游擊隊殺害，下令射殺 4 名平民，及炸毀一座農舍，造成十名老百姓身亡，乃遭被義大利的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2009 年，進而被德國法院判處終身監禁，時 91 歲。丹亞恩尤克為烏克蘭人，1941 年入伍為蘇聯紅軍士兵，1942 年被德軍俘虜，轉任警衛；戰後 1951 年移民美國。1977 年，美國司法部因丹亞恩尤克隱匿納粹集中營之警衛經歷，剝奪其公民資格，並引渡到以色列受審。以國法院一度認為其即凌虐猶太人的「恐怖伊凡」，1988 年判處死刑，1993 年證明恐怖伊凡另有其人，乃改判無罪，1998 年恢復美國公民資格。1999 年，美國司法部以他曾任波蘭境內索比堡納粹集中營警衛為由，再度提控。2002 年，美國認為他確實積極參與殺害近 3 萬名猶太人，再度剝奪公民資格，2005 年裁定驅逐出境。2009 年，丹亞恩尤克 89 歲，德國仍發出拘捕令，美國亦將之遞解出境至德國；2011 年判處 5 年有期徒刑。奧斯卡·葛朗寧，曾為銀行會計，1940 年應徵入伍，並主動加入納粹黨警衛軍，1942 年至奧斯維辛集中營服役；戰後居住德國北部呂內堡，2005 年，曾接受 BBC (BBC News Channel, 英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 和新聞雜誌“Der Spiegel”(《明鏡》週刊) 採訪。2015 年，葛朗寧被指控於 1944 年參與謀殺 30 萬人，並判處 4 年有期徒刑，時 94 歲。參見〈最後納粹審判 終身監禁〉，《歐洲日報》，2009 年 8 月 13 日，第 7 版；〈殺 3 萬猶太人 二戰警衛將受審〉，《聯合報》，2009 年 3 月 15 日，第 AA2 版；〈助納粹殺人 60 年後引渡返德受審〉，《聯合報》，2009 年 5 月 13 日，第 A11 版；〈93 歲奧斯威辛黨衛軍受審，被控共謀殺害 30 萬人〉，「紐約時報中文網」，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3 日，網址：<https://cn.nytimes.com/>；〈殺人幫凶 前納粹帳房判刑 4 年〉，「中時新聞網」，下載日期：2020 年 9 月 13 日，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chdtv>。

44 石玉峰(1928-1953)，臺南人。戰後，1945 年就讀臺灣大學先修班理科，後升至工學院機械系。據官方資料載，石氏於 1949 年 8 月經楊斌彥介紹參加朱毛共產黨組織，與羅吉月、陳光仁同一小組，受楊氏領導。嗣奉上級指示，於同年 11 月在臺大吸收吳東烈、施至成參加組織，由幹部

港的共產黨員。因為我有跟他來往，所以曉得他跑路時曾在麻豆藏匿。而我另有一個中學學弟陳榮添，⁴⁵ 晚我一期，後來讀師大，跟我滿熟的，他跟石玉峰也是好朋友。陳榮添更是我另一位

李潔監誓，自為小組長，教育吳氏等研讀「新民主主義」等書。1950年自臺大畢業，因政府查緝嚴密，石氏乃蟄伏不動，且任教於曾文農業職業學校（今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1951年藏匿吳氏家中，並由吳氏交與陳榮添身分證一紙，遂變更照片藉以掩護。1952年1月，石氏遭臺南縣警察局查獲，臺灣省警務處送案。1953年2月，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確定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同年3月3日被槍決。參見〈國立臺灣大學新舊校長交接清冊（1946年8-12月）〉，收於《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125）》（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91；「補呈台灣地區在逃通緝總名冊」、「石玉峰等叛亂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3/1111/18/087、B3750347701/0041/3132244/244；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s://twjtdb.nhrm.gov.tw/>；〈匪台灣省工委會台大支部石玉峰等叛亂案〉，收於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98-302。

- 45 陳榮添（1928-1953），臺南人。據官方資料載，陳榮添與吳東烈、施至成係中學同學，時相往來；1950年，陳氏曾向施氏借「歷史唯物論」，並自購左傾之「兩條路」等書閱讀，而施氏亦告知陳氏要有唯物史觀看法等語。1951年7月間，石玉峰逃至吳氏家中，由吳氏收容藏匿於山寮達半年之久；同月，吳氏向陳氏取得國民身分證，交石氏使用，由其自行更換相片，持為己有，藉以掩護。陳氏則於同年7月12日偽稱遺失，向臺南市西區區公所聲請補發。1952年，陳氏遭臺南縣警察局查獲，臺灣省警務處送案，案發時為臺灣師範學院學生。同年6月，經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處有期徒刑5年3個月；9月，總統蔣介石改判死刑。至1953年2月，確定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同年3月3日被槍決。參見「石玉峰等叛亂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41/3132244/244；國家人權博物館，「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下載日期：2020年8月27日，網址：<https://twjtdb.nhrm.gov.tw/>；〈匪台灣省工委會台大支部石玉峰等叛亂案〉，收於國家安全局印，《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頁298-302。

中學同窗施金池⁴⁶的舅子，是施金池太太（陳瑞珠）的哥哥，並且施金池當過臺灣省教育廳廳長、教育部常務次長。據我聽說，石玉峰跑路期間，躲在陳榮添家3天，離開時就帶走陳榮添的身分證，因為住旅館沒有登記身分證不行，又不能用自己的，否則馬上會被報案抓走，他只好拿朋友的來用。

石玉峰被逮捕以後，就發現他使用別人的身分證，他供稱是他偷拿的，陳榮添也說被人拿走的，可是真相不明，不知道怎樣一回事，總之陳榮添被判處12年徒刑，控訴他「知匪不報」，判決上呈到蔣介石那裡，竟改成「死刑可也」。蔣介石認為這不只是「知匪」而已，更加控他「資匪」——資助「匪諜」逃亡，然後把他槍決了。這份判決書是我朋友後來查出來的，我親眼過目，看有多可憐，陳榮添的案子才叫冤枉。因此，除了蔣介石的改判行為要公布出來，對受害者施以酷刑的人、做出政治判決的法官，也都要揪出來，至少要公布姓名。

46 施金池（1928-2015），臺南人，1947年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今臺南大學），任教該校附屬小學（今南大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後至臺灣師範學院進修教育學系，1958年再自師大教育研究所畢業，留校擔任助教、講師。1960年任北門中學校長。1972年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副廳長，1976年任臺北市教育局局長，1979年升任省教育廳廳長。1981年調任教育部常務次長。1992年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秘書長。亦投入童軍教育，歷任中國童子軍總會（今中華民國童軍總會）駐會常務理事、童子軍文物供應中心董事長、第六次全國大露營（1986）之營主任等；並透過童軍運動進行國民外交，如1982年起與泰國童軍交流。參見李耀淳、黃小芬、謝政諭，〈終生服膺與奉獻童軍「做中學」理念—專訪施金池前次長〉，引自「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網址：<http://scouting.edu.tw/Content.aspx?SeqNo=553&lang=big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網站，下載日期：2020年8月26日，網址：<http://archives.lib.ntnu.edu.tw/index.jsp>。

周美里：我父親沒有任何政治企圖，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無端被軍人槍擊，大難雖沒死，但是一生卻因此而改變，難以擺脫這個烙印。未來希望政府處理二二八事件或是白色恐怖的歷史時，應該要讓人知曉真相，而這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更是重點所在，假如沒有公布加害者姓名，或者沒有批判加害者，若一點懲罰都沒有，以後還是會有人願意當加害者。此外，對於許多冤死的人，公布加害者，更是給他們一個公平的交代